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七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三五期 ——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5e)

【抗拒遗忘】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 ——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余 杰
【千秋功罪】死人张春桥	刘自立
【动态报道】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在汕头启用	卢健辉
【以史为鉴】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的诞生	子 南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二）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抗拒遗忘】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
——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 余 杰 •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西蒙·魏森塔尔，将自己后半生的时间全部用于追捕逃亡纳粹屠夫的事业。魏森塔尔为何会这样做呢？他将自己无情地追逐纳粹罪犯的动机概括成一个寓言：在来世，我们犹太人将和大屠杀的受害者们相遇。受害者们会问：“你们生前干什么了？”有人说：“我是律师。”另一个人说：“我是教师。”而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德）吉多·克诺普《党卫军档案》

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批评日本方面修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历史的部分时，我忽然有一种“贼喊捉贼”的荒谬感。日本右翼分子“死不认错”的顽固态度固然应当批评之，但与韩国人义愤填膺的抨击相比，中国人的反对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韩国早已进入民主社会，国民享有言论自由，对自身历史实现了充分的复原与“去毒”——昔日的独裁者被送上了法庭的审判席，

军队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光州事件”也得到了彻底的调查，死难者获得了国家赔偿。因此，在对内对外的事务中，韩国人民都能自豪而自由得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之相反，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伦理上依然处于“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的野蛮状态。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的饥荒以及文革惨剧，直到邓小平时代的天安门屠杀，以及江泽民时代延续至今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统统都是不可言说的“禁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语文、历史、政治等科目的教科书，全都充斥着黑白颠倒的谎言——一百步笑五十步，如何可能？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尊严感的民族，如何能够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与犹太人相比庶几近乎。然而，中国的幸存者当中没有出现自己的韦塞尔——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相与正义，终于促成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成一座“大屠杀博物馆”；中国的幸存者当中也没有出现自己的魏森塔尔——他创建了一个收藏犹太民族苦难历史的文献中心，这个文献中心利用其掌握的档案材料将一千两百名逃之夭夭的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在中国，仅仅过去三十多年的文革，已经成为模糊不清的“上古历史”，年轻一代的学者们还没有弄清这场血雨腥风究竟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却开始发掘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了；仅仅过去十多年的天安门屠杀，同样也变成了像百慕达三角洲一样的谜团，正在长大的孩子们不相信军队真的使用坦克与机枪屠杀人民，他们相信正是党的“果断决策”方才造就了今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沉默，是铁一样的沉默造就了历史的断层；恐惧，是梦一样的恐惧造就了故意的遗忘。那么，当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面面对那千千万万的受害者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像韦塞尔和魏森塔尔那样无愧地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忘记你们”吗？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王友琴、杨克林、宋永毅、徐友渔等文革研究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鲁礼安的这部“一个人的文革史”（方方语）也表示深深的敬意。当年，作为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鲁礼安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北斗星学会”、起草“决派宣言”、编辑《扬子江评论》，一跃成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力的“笔杆子”。一九六八年七月，鲁礼安被绑架和囚禁。不久，他深陷于所谓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中，被非法投入单人牢房关押达十年有余。鲁礼安的《仰天长啸》是我所读到的第一本全景式的文革回忆录。在我诞生的时候，文革已接近尾声。除了幼稚园时一直弄不清楚刘少奇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外，我对文革几乎一无所知。而对文革的无知，将直接影响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正确解读，并削弱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变异的深入思考——而这一切，又都是一名知识份子“关怀中国”的前提：要恢复我们的尊严，就必须了解我们是如何失去尊严的；要捍卫我们的自由，就必须认识那一页自由受到最惨痛的践踏的历史。今天，鲁礼安开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种亲历者的讲述，与学者的材料搜集、历史研究乃至理论阐释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部回忆录让我发现了另外一种红卫兵——与自称“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和《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所定义和描述的红卫兵迥然不同“红卫兵”。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份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而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他成为若干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作者，并组织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队”——当然，他一直沉浸在理论和逻辑的激情之中，并没有发起或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在投入文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在其乌托邦狂想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导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一己之私欲。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但他拒不认错，先是在庐山会议上整倒彭德怀，后来又担心刘少奇秋后算帐，害怕自己死后落得像史达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而鲁礼安之所以全身心投入文革，乃是

从马克思原典和巴黎公社的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殊不知，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鲁礼安迅速被专政机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他的结局早已注定——“在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所有争取思想自由的尝试，都会遭到无情的镇压。”

在被捕之前，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比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的大右派们晚了十年，其深度与广度也无法与之相比，因为他这一代人是在“红旗下长大”，与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联系被斩断了，他可以接触到的、可以成为精神资源的惟有马克思和鲁迅。即便如此，武汉武斗趋近“局部战争”的状况，数十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伤亡，使得鲁礼安的毛泽东崇拜发生了动摇：“我想到‘七二零’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想到‘七二零’后的钢新之争，想到这些派别之间的斗争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那些在武斗中横尸街头的同学也好，那些被流弹或‘枪走火’误杀的同胞也罢，他们真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死’，而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他们在九泉之下，真的能够安祥地合上眼睛么？”鲁礼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了“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的论述，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他在单身囚牢中把血迹斑斑的墙壁当作毛泽东反问道：“主席，我想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是不是与领导者的想法相左。我还想说，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我虽渺小，虽微不足道，但我也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我的价值与尊严。而且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价值与尊严，我才落到了这种境地。假使我没有思想的勇气，或没有勇气发表自己的思想，我就不会落到这种境地，但人的价值与尊严呢？”

鲁礼安的回忆录中，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文革时期人性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人们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为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热情等情绪驱使着肆无忌惮地作恶，而伟大领袖如同在幕后操纵的导演，他并不在乎演员的生死。正如法国学者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人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物的仇恨深深得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憎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也憎恨自己的同党。”而更值得重视的是鲁礼安对十年牢狱生活的描写，在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强制劳动、单独关押以及饥饿的折磨中，鲁礼安能够生存下来并且没有疯掉，得益于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信仰的力量，他的心中有来自神启的天籁之音《平安夜》，这恬美宁静的乐曲与语录歌曲的暴虐邪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长期受到无神论思想荼毒的青年，在那最绝望的时刻终于向上帝跪下来合掌祷告。鲁礼安为后人呈现了无比真实的“一个人的古拉格”，这样的段落可以同近年来出版的“夹边沟系列”和劳改基金会编辑的“黑石书系”放在一起参照阅读。

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将众多受株连者长期关押致使其中多人精神失常，殃及群众数十万。作为该“钦定大案”的“首犯”，鲁礼案在坐了十一年的黑牢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纸不到七百字的“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书。悲乎？喜乎？荒诞乎？鲁礼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绝对的无辜者，而在回忆录中只有喋喋不休的诉苦。相反，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我就想到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我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我无法回答，也不敢回答，甚至不敢彻底地去想。”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人、打过人、折磨过人，但并不能说自己就完全无罪了，毛似乎也没有这样做过，他只是在深宫里发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罢了。波兰著名异议知识份子米奇尼克认为，“大家”与“独裁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关系，“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 and 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汤玛斯·曼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

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正如作为德国人的汤玛斯·曼所说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和作为波兰人的米奇尼克所说的“雅鲁泽尔斯基——我们的兄弟”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同样难堪的现实“毛泽东——我们的兄弟”。这种说法并不是为毛泽东脱罪，而是说“我们并没有外在于毛泽东”——我们是控诉者，我们也应当是忏悔者。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如同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 原载《观察》

~~~~~  
【千秋功罪】

死人张春桥

• 刘自立 •

张春桥死了。他何时死去，好像有些争议；但是依笔者观察，张真正死去的时间是在那个人死去的当天。事件自然要推到 1976 年的那个日子。

记得那一天中午后，我的一个将军子弟朋友跑到我家，他笑逐颜开地告诉我一个重大新闻，说是，他，死了！

真的吗？我们稍息后，顿片刻，就终于开怀大笑了，四只眼睛放出异样的光辉。

四点钟午后，消息得到证实，广播了。

这也就是说，毛一死，四人帮就死定了，张亦不可以幸免。

以后发生的事情按照这个政治逻辑随之发生。大街小巷上红旗飘飘，锣鼓喧阗，人们又唱又跳，作画写诗，好不热闹。但是此刻，我却并不那么忘乎所以。为什么，也搞不太清楚，只是忽忽然想起看过的拿破仑的一句话，大意是，我凯旋而归，人们欢呼雀跃，但是我上断头台，他们也一样欢呼雀跃。这句话点出什么要害？似乎可以证明。在多少次诸如此类的欢呼雀跃中，群众像浪潮一样涌来涌去，全无轨迹可寻。他们走上街头，完全可以因为完全相反的目的。好像他们很容易就有了某种胜利感，欢呼雀跃感，说，时间开始了啥的。也不知道时间开始了多少次！殊不知，他们的笑的权利，游行和作画写诗的权利却是人家给的。设想如果张春桥做了主席，他们不是也要上街游行，大肆欢呼一番吗？

所谓“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是我做报人的父亲在记述 40 年代末反蒋游行时的一句文章标题。可惜他走了，也没有看见这次的堂堂正正。这个话，我考证，来自黄遵宪的诗句。于是，堂堂之中国人果然在四人帮去后，就有了做人的正正之尊吗？没有！差得远呢！

张春桥之死，果然是某种正义之师的制裁吗？

是，也不是。

何以见得？一个最为明显的因素是，逮捕四人帮的法理依据何在？

四人帮是应该被打倒的。虽然各国宪法里好像没有“打倒”这个语汇。只是中国人喜欢这样用词。就是说，政治对手，在民主国家里被制裁，应该依据法律手段，像美国依据宪政宪法对待尼克松这类政客的无耻一样，在媒体上曝光，揭露，继而法办之；而不是似我们的华主席，叶将军所使用的手段。这类手段和毛的打倒刘少奇的手段如出一辙，就是用宫廷政变的办法。

这个办法也许在那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敌我力量诡秘相处，又都是使用一个政治理据，就是都是毛的信徒和学生。何以毛尸骨未寒就如何如何，有一点争议。就只好如此这般一下，说是担心投鼠忌器。

但是这毕竟不是宪政生活应该具备的手法。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也许还会使用之，只要还不是法治。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政体国体的缺陷没有根除。

因为不可以公开。不公开，就不可召集大会，制定选票，得出裁决。要一下子就“最后解决”。

我们的做法往往就是关键时候不可以开会，不可以讨论，不可以表决（不到关键时刻却是大会小会瞎开），那样就坏事情。因为，你要这样做，反方是不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做的，你就被打倒，有被打倒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叶啊，汪啊，华啊，就一下子做了。

这个做法有没有民意基础呢？有。这个基础就是四。五运动。

所以，人们没有追究法律程序（法律程序是候补的）。呈现出对于那次行动的欢呼雀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做法就是健康和民主的；他的危险在于，如果历史发生一个逆转，张春桥也会这样做。

至于他们没有有效的非和平手段，没有军权，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却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于是，张坐在了被告席上。

有人说，张一言不发，很坚强。笔者也许同意这个说法。

他有啥好说的呢？没啥好说的。原因是：

一，他知道他们这个游戏无是非可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二，因为，他的理论基础是恍惚的。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因为，毛的做法矛盾百出，不让他当总理，是为证。他知道，毛的脾气，就不可能坚持原则，坚持也是白搭。毛一下子就否定了。毛虽然打倒林，但是也没有把权利交给张，是半交给周。毛的失误，就在于他幻觉起作用，可以万岁。

三，他知道，没有辩护的可能性。所有的辩护权都被他们自己消灭了。他们打倒这个那个，都是不给辩护权的。他现在还要辩护什么呢？辩护个屁！

四，他依稀可见的沉默，体现在他对于法庭的蔑视，他蔑视那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特色政治，他不想争辩，是非，真理，在他心里早就被抹去了，即便对毛，无论死的活的，现在都

没有用。

五，他懊悔自己没有政治手段取胜，懊悔没有使用更加流氓的手段，先下手为强。

等等。

所以，他没有说话，面部表情阴沉，内心充满复杂感。

但是，这个人有没有一点点精神支柱呢？也许有。

前述他的反对特权和上海人民公社理想，其实，他也是又相信，又不相信的。

笔者少年时代就是从上海公社联想到巴黎公社，1967年就跟随毛/张那种实践，那种理论，写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大字报，以为是毛发动文革之反特权目标。因为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里读到那些美妙的段落。如，取消常备军，政府人员拿熟练工人工资，等等。

这是一个误解。张真的相信列宁主义吗？见鬼！他知道许多特权。江青，林彪过的日子，毛过的日子，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吗？当然不是。所以，出入那堵红墙的特权非但没有因为文革被取消，反而变得使人更加不可理喻。就不要说他们的荒唐的私生活了。所以，张的反特权实在是一个笑话。

现在，张春桥死了。关于他的盖棺定论应该是，他也是毛的一条狗。这条狗是悲哀的，他知道他的死是毛的死的自然延续。他没有什么申辩，申辩是无效的。

而我们对他的追思——请原谅，我没有更好的说辞——就是追思他这个死人迫害过的无数无辜冤死者的亡魂。这个死有余辜者死了，不值得做更多的事情。

□ 原载《议报》第198期

~~~~~

【动态报道】

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在汕头启用

• 卢健辉 •

中国大陆首个以“文化大革命”残酷历史为展出题材的“文革博物馆”在广东汕头问世。这个“半官方”性质、由民间出资兴建的博物馆获得中共元老任仲夷、文坛巨人巴金及大批老一辈中共党员的支持，其间几经波折。

香港明报今天报导，由于这是中国首个以“文革”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文革人性丧尽、政治斗争的残酷情景，包括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大量照片及史料，因而受到外界关注。馆内还有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题词。

此馆由汕头市澄海区连上镇涂城村塔山旅游区管委会兴建，建于汕头市澄海区塔山之上的塔园内，属塔园内的景点之一。塔园内共有八个景点，并有孔子雕像、叶剑英雕像等。塔山上原本无塔，现在建起一塔，作为“文革纪念馆”主体建筑，塔外周围林立着安放文革受害者骨灰的墓碑。进入塔园的门票每次五元人民币，而博物馆则不收门票。

报导说，塔内四周墙壁上共有六百多幅石刻雕像，全部由当地有名的石刻匠人雕成。雕像包括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中共名人刘少奇、黄克诚、巴金等的照片及大量史料，以及“走资派”被批斗、被虐待的雕像和史料，还有任仲夷的题词。

塔山旅游区管委会一名负责人介绍，博物馆在兴建过程中几经波折，起初政府不同意亦不拨款，因为涉及文革，钗h本地领导干部害怕。后来在一位已退休的副市长的牵头下，采取民间集资的方式，总算实现了。

他说，建这座博物馆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十年浩劫永远不再在中国大地重演。

这名负责人表示，文革中汕头的“武斗”（即因政治立场不同，各派之间打群架）很惨烈，仅澄海区就死亡四百多人，所以，人们对兴建这个博物馆非常热心，捐款来自省内外各地，不少人一捐就是十万八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位八十岁老人捐出了毕生积蓄。

这个博物馆于二零零四年底完工，今年春节前开放。开放两个月来，有不少市民和退休老干部来参观，包括一些来自北京的退休老部长，在职官员则较少。

近期汕头市有现职官员打破禁忌，几位市级领导也前来参观，并在参观后赞扬他们“为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

~~~~~

## 【以史为鉴】

### 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的诞生

• 子 南 •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1985年，巴金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而今，这位102岁的老人，在多年缠绵病榻之后，不知是否还可以从他家人那里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个民间的文革博物馆，经9年筹创，最近终于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域外的塔山景区浮出水面。

### ◇ 反思“文革”的文革博物馆

有关文革博物馆的消息近年来已偶有所见。在上海附近的江苏昆山锦溪镇，一个以“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自许的水乡，有一处景点即名为“文革博物馆”，内中仅陈列了一些“文革”宣传品。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地产商樊建川去年也亮出类似的计划，但外滩记者近日致电这位官员出身并爱好收藏的老板时，他反复强调，这只是他要创办的系列展馆中的一个“文革艺术品陈列馆”。该馆目前仍未开业。

曾经偶然瞥见过昆山锦溪“文革博物馆”的徐友渔，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关注“文革”研究。当外滩记者电话找到他时，他还不知道也不相信，僻居粤东澄海的文革博物馆，虽同为民间出身，却显得颇有底蕴。

今年4月17日，《汕头都市报》刊出报道“澄海塔园建国内首家民间文革博物馆”之后，

外滩记者和多家媒体记者陆续赶来，第一次徜徉于这片秀丽的山水间，目睹“文革”中死于武斗的70多位当地人的20多座坟墓，品评纪念“文革”中当地死难的16位知名人士的碑林，聚焦“恸石”、“思安塔”、“警钟长鸣”亭、“明镜台”、“史鉴山屋”、10米高“神笔”巨石和不着一字的“石书”等寓意深厚的建筑。

整个景区的核心建筑，则是以“文革博物馆”命名的仿天坛外形设计的一座大殿，馆内墙壁上镶嵌着漆黑锃亮的墨石板材影雕，上有系统反映“文革”历史的1100幅图片和24万字；馆内各种相关书籍现有几百本，亦涉及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历史。

总称“塔园”的这13处景点，主题就是反思“文革”。在塔园创办者的心目中，整个塔园就是文革博物馆。刻在石上的众多名人警句中，有著名学者季羨林在《牛棚杂忆》里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 没有“身份”的总策划彭启安

全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何以降生于这个寂寂无闻的海滨？

“还不就是因为这个彭老市长！”当地一位不愿公开亮相的官员面对外滩记者的询问笑着作答。

记者见到的这位“彭老市长”彭启安，却是一个过去大队书记形象的74岁老人——一身便服，脚上的休闲皮鞋沾满积久的灰尘，说起普通话来总是将“酝酿”读成“问朗”，“能源”读成“林云”，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文革”前便是揭阳县委副书记（揭阳县原属汕头市）兼榕城镇党委书记，1983年后当过10年的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和5年的汕头市政府顾问，并多年主管交通能源通讯等肥缺部门的官场老将。“开始哪里想到搞这个文革博物馆！”彭启安回答外滩记者说，“当初只是想在这些‘文革’死难者埋的地方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

他也是澄海人，老家所在的村子挨着文革博物馆所在的涂城村。1996年下半年，彭启安经过塔山时看到这20多座坟墓，其中还有两座合葬了20多人。好奇之下，一问才知，这些死者都是“文革”时被打死的澄海县人；合葬人数最多的有24人，都是涂城村村民，“文革”后发掘到尸骨时，已无法辨别，只好合葬在一起。在整个“文革”中，澄海死难者达400多人，伤残4500多人，属于汕头地区的重灾区，涂城村尤为惨重。

这时候的彭启安还不知道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馆的事，但他找到的十几位在当地曾经身居高位的老同志和涂城村的干部群众都很赞同这一想法。这里原本就是当地著名的塔山旅游区，拥有一座870年历史的古寺，还有“文革”后为纪念家乡名人许世杰、余锡渠而建的两座亭阁。将近10年的时间里，冠名“塔园”之下的一处处纪念建筑陆续建立。

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除了巴金遥远的呼唤之外，还有更直接的启发。2002年10月1日，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收到塔园寄去的材料后，在回信中说：“你们是否想到，把它作为一个博物馆来建设？”2003年5月，由汕头市长位上调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李春洪去彭启安家辞行，他拿出一部香港出版的两册大本头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说，这是他在北京花了1500元买的，感觉放在自己家里也没有什么大用，也许放在塔园的“史鉴山屋”作用更大。2004年2月，彭启安在塔山上的“养老院”会上正式提议，专门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得到大家赞成。次月动工，当年12月，“文革博物馆”终于落成。



塔园迄今筹集使用资金已有1100万元之巨，但包括彭启安在内，这些老同志在塔园的建设中至今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和“身份”。塔园的日常管理仍由涂城村塔山旅游区管委会负责，而彭因为为官多年口碑甚佳，成为这个“养老院”项目事实上的主持人。所有捐款，有彭曾经分管的交通能源系统单位和个人的大笔赞助，有当地百姓和侨民的捐献，出生在潮州的“华人首富”李嘉诚经彭两次写信后馈赠的30万元，甚至还有彭1998年担任汕头市政府顾问最后一年时自己可以支配的60万政府基金。

执掌1100万建设资金签字权的彭启安，没有在塔园支取薪水，拿的还是自己4000多元的正厅级干部退休金，并且，至今还要租车往返于汕头市区的家和塔园之间。3年前，他每年有数次骑自行车来回，因为几次路上被撞，只好放弃这一多年所好。不烟不酒，一天六七小时睡眠，这位74岁的老人登山时步履轻快。外滩记者跟一位涂城村村民攀谈时，他对两位村干部的豪宅颇为不忿，说起“彭老市长”时却景仰备至。

#### ◇ 争议与规范

4月27日下午，彭启安陪同外滩记者，驱车由汕头市区北行出发，探访牛田洋“七·二八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即使在汕头当地，“文革”中的这个大灾难发生地也并不为大家熟知，知道这条路的人更少。彭启安也是两年前才跟孙子一起骑车找到这里的。

1969年7月28日，470名解放军官兵和83名大学生在这里死于强台风和大海潮袭击。当时这里是广州军区的牛田洋生产基地，现有史料载明，在“人定胜天”、“人在大堤在”口号指导下，大堤决口之时，现场的2000多人，包括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仍手挽着手“跳入缺口”试图“堵住海潮”。

“你看看这个。”彭启安指着碑文中的结语——“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用生命之魂谱写了军民抗击强台风、大海潮的浩然之歌。”

“就这样写，合适吗？”过了片刻，彭启安才缓缓道来。

在塔园早期设立的“文革”死难者16人碑林中的碑文上，有同样的尴尬。

“当时我们不敢写‘打死’、‘活埋’，只写‘遇难’。”彭启安现场解读。“这些碑文最难写了，要描述‘文革’的残酷，但又怕得罪人。”

彭启安对自己在“文革”中挨的400场批斗已比较淡然，他甚至想不起来具体的批斗者是谁。当时他在揭阳县，记忆最深的是左胸挨过的一拳，使他至今阴雨天还隐隐作痛。造反派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狡猾！再不老实，把你押到澄海！”

澄海武斗的残暴，被总结出“100种刑罚”，“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比下十八层地狱还要下十八层地狱！”彭启安说。

塔园的9年之路，曾经因为澄海方面的反对而搁置过一段时间。幸好，僵局后来被打破。2003年2月11日，在汕头市市长李春洪参加的塔园第一次景点落成庆典上，彭启安在讲台上说：“当时的执政者经过深思熟虑，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实质上也是支持的态度。”2005年3月26日，当地领导再次视察塔园，对塔园建设和彭启安的执着和奋斗精神给予

了肯定。

“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从来没有禁止建文革博物馆的说法。相反，如果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按照邓小平说的要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文革博物馆是应当建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生部副主任赵立人告诉外滩记者。

对于“搞文革博物馆是揭伤疤”的说法，赵立人认为，有些人现在还享受着当年“文革”带来的好处，他们内心不会完全否定文革的。

“问题是采用什么方式、如何规范？你不规范，人家就会有争议。”一位支持塔园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希望公开他的名字的当地官员，对外滩记者作出了另一种解读。“这个文革博物馆还不是达到像巴金设想的那样，史料的采集、景点的设计和表达的一些倾向都需要规范。我们愿意帮助他去做这些工作。”

“文革博物馆是需要规范。”“长老院”的杨方笙说，“彭启安的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现有的规划建设基本上还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系统的规划，景点布置有点杂，需要充实内容提升品位。”

“博物馆在国际上现在也是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告诉外滩记者，“我认识的一个美籍犹太裔著名历史学家，是专门研究二战纪念博物馆的，他对波兰、以色列办的纪念被害犹太人博物馆都很不满意。在他看来，人类苦难的历史，以博物馆的形式是难以反映的。”

“我返回大自然（退休）六七年了，按土改的做法，3年改划一次成分，我已经改变了两次身份了。我的余热已经用完。”在车上，略显疲惫的彭启安有些焦急。目前，除了“长老院”的老同志义务搜集整理一些资料外，直接负责博物馆资料整理和对外工作的，只有他本人和一个月薪500元、60多岁的当地村民。网络资料对他们来说还很陌生，“文革”时发生在广西的武斗吃人事件对他们还是个新闻。然而，彭启安更焦急的还不是这些。

#### ◇ 题刻中的反思

“文革”十年浩劫，澄海是重灾区。《塔园碑记》有如下记载：“斯时也，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魑魅肆虐，国法凌夷，冤案如山，尸陈街野，道路侧目，神人同悲！”作为全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塔园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意义。

目前，馆内共有1100多幅墨石板材影雕，贴满在四周的墙壁上。这些影雕全部由当地有名的石刻匠人雕刻而成，内有包括刘少奇、黄克诚、彭真等人在内的“走资派”被批斗、被虐待的大量图片和史料。

1985年巴金提议建设文革博物馆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悲剧重演。他的话刻在塔园的石碑上：“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毁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亦有相同的题词。2001年4月5日，他题下：“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这被认为是塔园的灵魂。

巴金的想法，得到了老一辈中共党员和文化名人的支持和响应。文革博物馆内的展壁，思

安塔和塔园内的青石题刻，铭记了他们反思“文革”的共识：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韦君宜《思痛录》）

“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人民，并不是任何一个地位崇高的‘权威人物’。任何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权威，都站不住，不是由权威决定如何写历史，而是由历史来为权威定‘位置’。”（杨立《带刺的红玫瑰》）

□ 《外滩画报》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二）

• 刘文忠 •

驳斥“十六条”

文化大革命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波澜壮阔地疯狂发展。一批又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纷纷“落马”罢官、批斗，一批又一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出“示众”，关进“牛棚”，投入监牢。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钦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是何等写得好啊！”严厉斥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指刘少奇、邓小平及各省市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8月8日，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林彪位列第二，成了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会议并没有重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原副主席职务和邓小平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实际上，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成了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号、二号人物遭受批斗。会议公报天下，广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锣鼓喧天，万众欢腾，热烈盛大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而辉哥却一连几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我看见他，神情变化异常。有几个深夜，我已睡了一大觉醒来，见他竟还呆呆地端坐在书桌边，不知在沉思玄想什么。他为了不妨碍父亲与我休息，有意将书桌台灯罩上贴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

记得当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后，辉哥就联系《海瑞罢官》《三家村》一起，对我分析说：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是非之地。吴晗是胡适门下弟子，胡适的思想在北大师生中影响根深蒂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北大，中国现代一批最杰出的思想家诞生在北大。可以说，那里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摇篮。毛泽东批吴晗他们、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就是首先向北大开刀，向全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堡垒开刀。当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公布，辉哥更是愤慨万分地对我说，毛泽东从对知识分子下毒手开始，向党内栋梁骨干开刀，现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大功臣、身边的同事开刀了。刚刚开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从党中央“清理队伍”，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个国家主席、一个共产党总书记，一场大规模的围剿迫害运动开始了。果然不久，北京许多高校联合成立了“批刘火线指挥部”，国家主席刘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公民权利，被十多万红卫兵团团围困酷烈批斗，遭受惨

无人道的迫害，又对总书记邓小平逼令“深刻检讨”。辉哥一再愤愤感叹：“这还像个什么样的国家？”“这还像个什么样的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在默默地思索，他在深层次地考虑，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与共产党的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作者记忆有误，上述“批刘火线指挥部”等事发生在1967年，刘文辉不可能针对这种事发表评论。——编注）

八年多的“右派”灾难与“现反”帽子，不仅没有压垮辉哥，反而使他磨练得一副铮铮铁骨，在人间炼狱中炼出来一双火眼金睛。他系统大量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特别熟谙毛泽东选集，他又广涉力能所获的有关西方大哲学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经典名著，他从黑格尔、费尔巴哈、杜威、安吉尔、厄德诺、艺达基、马德瑞、华盛顿、林肯等人的著作、传记中追索、比较研究、深思熟虑。他深入地阅读、研究了胡适的不少著作，通读了鲁迅全集，以及胡风和他弟子们的许多作品。他还将中国古代孔孟先贤思想同西方先哲睿智言行作比较研究。为了更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制度，便于作东西方比较，他刻苦自学大学英语，与一些在交大、外语学院当老师的中学老同学交流、探索、辩论，朋友们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锐洞察力，那种摆脱禁锢的犀利智慧。自从戴上“现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后，除了白天受监督劳动，几乎天天夜晚读书思考不断。“文革”全面开始后，尽管屡遭非人的批斗、抄家、残酷惨虐，他思想车轮却依然在奔驰不息。他个人的行为被日夜监视，但敢于抗争的辉哥不甘寂寞，常叫我从厂里与社会上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我白天在单位里学会明哲保身，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参加大批判，抄写大字报，下班即窜到社会上、各大学和文艺部门，帮辉哥到处收集各种运动信息与材料。每当我带回一大卷红红绿绿的红卫兵小报、街头散发的传单，交到辉哥手上时，他总是高兴得如获至宝，常自拍拍这些材料说：“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一个完全被管制监视的人，谁能料想到，他却是比任何人都要全身心认真地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运动。

说句真心话，辉哥当时的异常大胆、毫不自顾的冒险行动，常使我提心吊胆。他提出自己要出外去看街头大字报。我自小对他言听计从，但这件事颇感为难。他这样的身份怎可抛头露面出去呢？何况白天不是监督劳动就是遭批斗，也无法脱身到马路上去啊！他聪明设计，深夜十点钟后，悄悄躲过邻居的监视，叫我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处，找个暗角落等他。第一次我试着这样做，他轻手轻脚摸到市民新村约定的墙角边，骑上我的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一夜无法安眠。天蒙蒙亮，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他亲身去看到了大字报的海洋，从中看出毛泽东身边一群宠、奸、亲信们如何手段卑鄙、伎俩横恶，践踏真理、大放谬论。记得有一次，他在交通大学看到一篇北京林学院李洪山写的“踢开中共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字报，由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作者记忆有误，查宋永毅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李洪山的大字报出现于1966年12月初，并不是“怀疑一切”思想的开始，刘文辉于11月28日被捕，也不可能看到此大字报。——编注）他回家告诉我，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我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他在大字报上引用胡适先生的一个观点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我知道三哥目的是想启发大学生们独立思考，对此，“文革”的当局者是决不允许的。第二天我再去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覆盖掉了。还有一次，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辉哥在半夜看到无人，就在大字报空白处，用粗体钢笔字写上：“这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错误。人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出身。一个人所受影响好坏，从实践中产生。不懂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这道理，实际上不是唯物主义，也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举一例子，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均

出身不好，也会有反动血统论，借这位谭兄的谬论，他们有什么资格领导文革？他们也应属被打倒之列。”辉哥回家得意地告诉了我，我既担心又好奇，第二天也去观看。听大学生都在传说，不知是谁，竟敢指桑骂槐，既批评了谭力夫的谬论，又点了中央文革各位领导的名，戳穿了他们的老底，厉害，厉害……。当然，辉哥“戳一枪”的那份大字报，也被别的大字报覆盖掉了。这两件事，使辉哥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的大字报完全处在无政府失控状况。他打算借大学校园各派组织混乱局面，寻找机会揭露文革这场阴谋。

白天，辉哥照样在里弄与老父亲一起扫垃圾、掏阴沟，即使一连几个通宵，他忙于去大学院校串联，没有合过眼，双眼熬得通红，但还是卖力地接受监督劳动，甚至时时叫老父亲少做点，让他全力来负担，专政队看到他滚得一身肮脏、卖力干活的样子，以为他真的在认罪改造了，其实谁都不知道，辉哥他恰恰在对着“文革”的腥风血雨冲锋陷阵，他早已把个人的安危、自身的劳累、命运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有一天夜里他在一所大学校园里，看到传抄的一个右派分子的恐吓信，内容揭露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这次文革是场更大的迫害。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被全文张贴出来，在大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从另一角度启发了他。他说，也想写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他还说，现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在这“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华大地，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让亿万民众团结起来挽倒狂澜，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泽东祸国害民路线。辉哥告诉我，他已经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他心中还在策划，想着手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专栏，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抄写贴到大学校园中去……。不料过了几天，又一批红卫兵闯进我家，将已抄多次的家中，再一次作地毯式抄查，竟将辉哥写好的分散暗藏在留下的书籍堆中的那二本小册子手稿全抄去了！幸好那些初中生几乎似文盲，看不懂什么，据说他们把辉哥所有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揉成纸包包，不知扔进哪个垃圾箱去了。虽然不见专政机关来追查政治问题，但辉哥心里默默伤痛了许多天，因为他历时两个月的战斗成果被无妄之灾销毁了！

敢作敢为、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性格，使辉哥心里燃起更猛烈的斗争怒火。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许他已深思熟虑了，犹如黄继光孤身扑上敌人的机枪碉堡洞口那般，断然地摊开了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叫我去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窃偷看，突然撞进家来坏了大事。他伏案奋笔疾书了4个小时，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辉哥要我与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我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向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着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辉哥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辉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辉哥计划决定，要我趁国庆节休假，赶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14封匿名信。

我有点犹豫为难，对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忍受”，辉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而担忧地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我：“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说毕，辉哥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光，凛凛无畏、誓言无声，好似听到他的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声。在他铜像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我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临危授命，欣然答应去杭州投寄。

我还记得辉哥在《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触目惊心的话语：“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之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辉哥用鲜血惨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醒世愤言，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如在黑夜中升跃起一颗亮耀的晨星。辉哥拼死独挽“文革”狂澜，毫不自顾命运走向何方。

串联上北京

“八·一八”毛泽东第一次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当他看到气势磅礴的红卫兵小将的游行队伍时，红光满面兴奋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毛泽东要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国几千万的红卫兵小将冲锋陷阵的生力军，所以他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各地来到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正式钦定了全国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文革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加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革命大串联掀起了新高潮。“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到天安门去接受红太阳红司令检阅！”成了全国几千万青年学生与革命师生的衷心愿望。一时间，“从毛主席身边归来”的红卫兵，如鱼跃龙门成了龙，成为革命青年的莫大荣耀。我在国庆节当天去杭州投寄14封匿名信给北京等八个城市14所高等院校，在火车站看到大批成群的青年学生涌去北京，心里禁不住动容痒熬，自己也想趁机出外大串联，到北京去见见当代伟人与独夫毛泽东。当夜返回上海家中，我向三哥汇报了投寄信件经过后，就同他悄悄商量了此事。辉哥听我说完，知道14封匿名信如计划寄出，眉宇间露出一丝欣喜，而当我提出要出外串联事，他双眉又立刻紧皱，默不作声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过些日子再说吧！”

从此，我每天到工厂照样上班，若无其事地跟大家一起参加大批判，出黑板报，高喊革命口号，下班后溜到街道马路与高等院校观看大字报，去听北京与各地来的红卫兵们聚集的辩论会。一天深夜里，我家后对面有家毛纺厂突然着火，人声鼎沸。睡梦中我被惊醒，急忙起床下楼观看，只见辉哥已抢先一步，翻越屋后花园竹篱笆，跳跃上对面厂房屋顶，脱下棉衣，劈劈啪啪地扑打火苗，不顾棉衣烧焦了许多。第二天，毛纺厂送来了感谢信。我的外甥们都称赞“三舅舅学雷锋”。辉哥脸上却莫名苦笑，我想辉哥他急公好义的秉性总是改不了。这天夜里，我趁他心情较为宽慰些，又悄悄提出了要外出大串联一事。辉哥捏指一算，14封信寄出快一个月，外界没有什么动静，估计公安局查不到我们，所以才点头答应，让我离开上海。一经三哥同意，我马上向要好的中学老同学的弟弟沈兴定借了红卫兵袖章与学生证，设法搞到一份红西南串联介绍信。我二哥文兵是转业军人，弄一套军装不成问题。于66年11月1日，我踏上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想赶上第六次毛泽东的接见。

隆隆赴京的列车，开出上海安亭，却被拦截停车了。上海市委派出的劝说队用高音喇叭呼叫：“红卫兵战友们，北京是首都，需要安定，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不应再去北京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应该就地闹革命。”这时听说，铁道部和北京市委向周总理告急：一因大串联，南东北西铁路事故不断，交通几乎瘫痪，全国铁路系统从领导到调度，靠边的靠边，批斗的批斗，造成一片混乱；二则北京市因为吃饭不要钱，全国各地几百万红卫兵涌进去，把北京的战备粮食都吃光，急得周总理拼命从全国调粮进京。又传说，毛主席接见要结束，到了北京也见不到主席他老人家。车上的红卫兵代表反击劝说队，用列车广播叫喊道：“北京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

中央战场，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红卫兵不去保卫毛主席谁去？难道让你们保皇派去？你们污蔑我们去保卫毛主席是给添麻烦，简直反动透顶！”广播里反复这样叫喊，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跃下列车，对拦截火车的劝说队无法无天地围攻追打，那些可怜的市委干部被战无不胜的红卫兵小将反击得四处逃遁。列车在停车了四个多小时后，终于伴随着车上上千人“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壮的毛主席诗词歌声继续隆隆前进。

北上大串联的列车上，每节车厢超载人员至少一倍以上。车厢像个罐头盒，红卫兵们像凤尾鱼，你我他相互之间，不是紧挨着，就是紧贴着，几乎处处无插足之空隙。有些学生索性爬坐在座位的靠背上，手抓行李架防掉下来。而有些更胆大的，爬上行李架，其上下空间太低窄，他们一个个弓背勾头，姿势活像只猴子。两人座位四人坐，三人座位六人坐，而一排排座位底下又钻躺着人，甘愿做“人下人”。尽管车窗一一打开着，车厢空气还是污浊不堪，口臭、汗臭、脚袜臭，令人直想作呕，只得屏息难熬。一分钱不花上北京见毛主席，这样的天下美事谁不想沾光？！红卫兵小将毕竟是伟大领袖红太阳培育的坚强无畏战士，人群挤轧再厉害，空气酸臭再难熬，照样雄赳赳气昂昂地上北京。问题也还有的，就是口渴，甚至尿憋。车厢里见不到一个列车乘务员，更谈不上供应开水。整部列车，据说除了司机及加煤的司员，其余列车员害怕红卫兵，都悄悄溜走了。连厕所里冲粪便的自来水也没有，臭气污秽冲天扑鼻。每一节车厢的厕所几乎都被反锁着，聪明的人不怕恶臭而把自己关在里边乘“单间”。车上的女红卫兵更可怜，人头攒动挤在厕所门外，吼叫敲打厕所门，喝令里面人快出来。等了好久，挤出一个人来，马上有十多个人拱挤进去。有的女孩子挤不进去，在厕所门外尿憋得哇哇哭叫。有的等不及进厕所已尿了裤子，丑态毕露，难以描述。列车到了一站，也没有人广播报站名，途经大站小站都没有卖吃的。好象红卫兵是红胡子强盗，抢掠成性，人人害怕，不敢来做点食品生意。某些站头上有水龙头，紧靠车厢门的一些红卫兵不待列车停稳，车门才半开，就挤跳下去，跑到水龙头边抢水解渴，争先恐后将嘴凑上龙头喝上几口，慌慌张张地赶回车上。不是紧挨车门的，谁也别想下去，一是挤轧不出去，二是即使力气大挤下去了，因费时过点，休想再赶上车来。列车将靠站头，大家七手八快，把车窗拉下关紧。站台上拥挤着大批红卫兵，他们拼命敲窗，想爬窗上车来，大声叫骂：“妈的，老子是北京红三司的，要急着回北京，开窗让我们上去。”上面车厢的人回敬：“妈的，小子你是北京人，应当去南方点火闹革命，让我们代你去北京，哥儿们，有给家里的口信，写成纸条交给我们，帮你带回去。”在这样一片吵骂、一片混乱中，列车终于路过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上巨型轮渡穿过万里长江。

列车到达山东济南站，不知哪一派的几个红卫兵，慷慨大方，在站台上搭起三排长桌，桌上堆集面包、饮料、水果。他们手提话筒，对每一节车厢高喊：“红卫兵战友们，你们辛苦了，前方铁路发生故障，列车要停靠一个多小时。请大家下来吃点东西、喝些水，一切免费供应。”车上的红卫兵们还未等车子停稳，从车门、车窗争先恐后往下挤，往下跳，扑向三排桌子，扑向水龙头，奔向车站厕所。突然间闹不清从哪里来的，自四面八方窜出几队红卫兵，像几股洪水般奔往各车厢门，蜂拥着上车，有些从车窗攀爬而上，跳跃进车厢。那几个亲如兄弟姐妹的犒劳者当然捷足先登，响起了一片“胜利了”的怪叫声。我们这批被骗下车的上海红卫兵回过神来，发觉上当，却为时已晚。大家纷纷如狂犬般不顾一切奔回列车，在车门边推挤一团，钻撞一起，不择手段，使出浑身解数，总算绝大多数又幸运地上车了。我虽然左脚残疾，但手劲特别好，年龄也比他们大些，与车厢里相识的朋友，一起合力，我先爬进窗来，再拉他们爬上车。车厢内更是一片混乱，一堆又一堆人在抢座位撕打起来。原先下车的上海红卫兵座位早被济南冲上来的占领，他们一个个后悔莫及，愤怒、漫骂，脏言乱语，吵成一片。有少数上不了车的红卫兵，在站台上用汽水瓶如枪林弹雨般袭击列车，几节车厢的窗玻璃被砸碎，有的人脸上被碎玻璃刺破。当列车启动后，我才从骗冲上来的红卫兵嘴里知道，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200名英勇战士，他们在兵团头头、北京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带领之下，来到山东曲阜完成中央文革康生、江青一伙直接指使的一项特大政治任务——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砸孔庙，毁孔林，挖孔墓，把孔子76代孙孔令贻的棺材打开，捣尸毁迹……红卫兵捣毁了几

千件极珍贵的文物。据说是“文革”扫四旧运动中一场破坏力最大最严重的民族文化遗产洗劫。他们兴奋不异，政治任务胜利完成后，在济南山东大学战友们帮助下，设计了在站台骗冲上车的妙局。

车厢里更为拥挤密不透气了，大家也吵骂得筋疲力尽了，列车夤夜开出济南，红卫兵们昏昏欲睡。大约过了一小时，火车又突然刹住不动了。被震醒的小将们纷纷猜测原因，不少胆大的人首先爬窗跳下去跑前面打听消息。回来告诉大家，前面有列火车压死了四个步行串联的红卫兵，我们火车也要临时停车几小时。列车停在荒山野里，又是半夜三更，不会再有人冲上来。于是大家纷纷爬出窗口跳下去，把憋了很久的尿哗哗洒在铁路旁。在黑夜朦胧中，车旁沿路上百人在撒尿甚至毫无忌惮地解大便，男的近些，女的跑得略远些，反正夜幕重重谁也看不清。初冬的凉风阵阵吹拂，夹带着一股股骚臭秽气扑鼻来。大家舍不得车外旷野的歇息，几乎都不急于爬回车厢，而在铁道边伸手划脚，活动身子。胆大的人跑到前面去观看压死的人。我跟着前往，到前面出事现场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四个红卫兵，一男三女，被火车碾压的血肉模糊，四肢破散，一股血腥味迷漫空间。同观的十几个男女中学生吓得嚎啕大哭。据当场处理善后的民警说，这是南京某大学一行20多人步行串联去北京的红卫兵，已走了几天，为了急于想见到毛主席，夜里他们背诵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毛主席诗词，雄赳赳沿铁道线夜行军，因疲惫不堪坐下休息，有些同学睡着了，东倒西歪躺到铁轨上。等站岗的人发觉火车过来，拼命摇醒沉睡的同学，悲惨的事故发生了。在当地民政与公安人员收尸车处理完毕开走后，我们的列车又继续前进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惨残车祸，对大家高昂的革命激情如倾盆冷水，每个车厢内都沉浸在疲劳不堪与恐怖寂静之中。列车开开停停，最终总算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朝圣天安门

红卫兵小将们纷纷下车，拎着各自小包行李，活像成群结队孙猴子那样，潮水般地涌出北京火车站。这里，红旗招展，红幅飘扬，一排举打着“某某部”“某某机关”“某某学校”红卫兵接待站的旗帜，亲切招呼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战友们。我跟着一批人登上了国家煤炭部接待站的大卡车。卡车启动，行驶在宽阔的大马路上，但见首都街头人山人海，蔚为奇观。真是“山河壮帝居，日月耀新天”，这里满眼是红色的海洋。怪不得最近上海也提出了变“绿化上海”为“赤化上海”，红旗、红幅、红墙、红语录，红是革命，绿是反动，上海上海就应是红色的大海。然而比之首都北京，确实又慢了半拍，你看，这里无处不红，无人不戴红袖章。满大街挤涌着来自天南地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和红色造反派。他们像各路诸侯，形形色色红一色的战旗飘扬。各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梭往来，不知有几百只高音喇叭在大喊大叫“郑重声明”、“严厉警告”、“最后通牒”……，有的在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有的在狂叫“冲、冲、冲”、“杀、杀、杀！”如果不是夹杂着嘹亮的《东方红》歌声，不是伴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等动人乐拍，人们真会把新中国的首都误看成清兵入关进京，或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的混乱情景。

我们到北京郊外煤炭部的红卫兵接待大院里下了车。时值傍晚，由东道主的热情安排，发给每人三只馒头、一撮酱菜，权当夜餐，先安排落实各自的寝舍，全是原先的宽空的办公室改成的，大家过军事化生活，席地摊铺睡觉。这里同北京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墙壁外表刷成了红色，上面书写着醒目的最高或最新指示。毛主席诗词歌曲白天响彻云霄，夜晚直冲星汉，也许除了我国的毛主席，世界上恒古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朝代的君王，大概都无福享受这般如此轰轰烈烈的狂热拥戴。在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红海都城，集中代表着六亿中国民众对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这里成了全国各地红卫兵的大本营，成了各地造反派的“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来到这里，才知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由于路上火车多次长时间误点，我们已错过了这个幸福时刻。好在接待站负责人员一来就安慰大家说，主席还要第七次接见，要大家安心在北京串联学习革

命经验，静心等候伟大领袖第七次接见的幸福佳音。

趁着等候接见的时日里，我跟随临时结识的红卫兵朋友们，在北京四出大串联。好在吃饭不要钱，乘车不要钱，任凭我要到哪里是那里。我去了早就梦想参观的胡适先生当年讲学的北京大学，看到成千上万的革命师生在批斗他们当今的党委书记陆平等党内走资派，在批斗老校长、人口理论专家马寅初，在批斗原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我去了清末由庚子赔款起因而创建的清华大学，看到广大革命师生在蒯大富等领袖指挥下，在批斗校长蒋南翔，以及数十名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我们又去了北师大，有幸看到能干的红卫兵女将谭厚兰正忙于策划大批判老校长老教授，遥见她那矫健的女大学生身影上窜下跳似的奔忙。在首都这些独领“文革”风骚的高等学府里，我看见贴满着“爆炸性的新闻”，如在北大校园里贴着一连串的所谓“百丑图”，手灵心愚的大学生们用漫画形式，画着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一系列党内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的奇形怪状的丑化像。北大、清华红卫兵是中央文革的左右手，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的阴谋诡计总是先通过这些高校透露出来，传令天下。所以我们在校园里看得眼花缭乱的许多“最新消息”，全是将要炮轰某某、打倒谁谁，砸烂什么人的狗头之类。我在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旁边，又看见毛主席亲自策划领导南昌起义，指挥前线作战的巨幅油画，还看见题为《井冈山会师》一画，画面上毛主席与林彪副主席紧紧握手，历史上朱德总司令的形象当然见不到了。我心里佩服革命师生、画家们的创造性篡改历史、偷天换日的老到功夫。谁都知道，去安源煤矿点燃革命烈火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谁都知道，南昌起义首倡领导者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周逸群他们，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乡间忙于准备秋收起义呢！同样谁都清楚，当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时，林彪至多仅是个连长（一说排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青年军官。我还看到一幅讽刺漫画，画的是异样大鼻子的刘少奇在一条船上撑篙渡河，异样胖雍的彭德怀在岸上挥手唱道：“送君送到大河旁，君的恩情永不忘。风里浪里你撑船，我持梭镖望君还。”红卫兵们的奇思妙想、挖苦恶作剧，可称巧夺天工，贻笑人间。我看见许多外地来参观学习的红卫兵，一个个认真地边看边记录，依葫芦画瓢。可以想象，不消几天，他们返回本地，北京红卫兵的天才创作就传布华夏、流毒天下。

正当大家沉浸在首都“文革”前线观摩学习中，一天傍晚回到接待站，接待所一位营长兴奋地告诉我们：“小将们，最最幸福的时刻就要到了！明天伟大统帅毛主席与林副统帅，中央文革首长们将在天安门检阅你们了！”大家听了一阵激动，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也手举语录红宝书跟着高呼。数呼“万岁”之后，那位营长又说：“为了保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绝对安全，现在宣布几条纪律，除了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必带以外，每人身上再也不得带任何东西，特别是金属物品，一律不准带，谁带了，一经查出，不仅无资格参加接见，还要严加论处。”营长又说了只许呼喊的口号，叫我们一一记录下来：“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他一连宣读了二十条革命口号。最后他说，大家排好队，跟着他到食堂去领干粮，准备明天在天安门广场吃午餐。当天夜里，大家都激动兴奋，难以合眼。

下半夜三点钟，号令起身集合。十一月中旬的北京夜里，寒风凛冽，许多人冻得嗦嗦发抖。我们由几辆公交汽车接送往市区西单附近。营长带队，命令我们分组报人数，前后左右看清楚，有没有陌生面孔混入，严防阶级敌人来捣乱破坏。并且大家互相搜身，有没有带着不准带的东西。我心里暗忖，我这个残疾人却是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多月前刚向全国投寄了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14封匿名信，若是被他们发觉，非得打死不可。幸好神不知鬼不觉，我照样可以混在这里一同去朝圣天安门。这时，我们列队拐进了西单大街一条胡同，天才蒙蒙亮，等待天色大亮，东方红、太阳升。我环视观看，这条胡同街上拥塞满都是要接见的红卫兵大军。八点正，我们被通知开始进入西单大街。我被解放军发觉脚不好，有残疾，照顾我安排在第一排，即在解放军战士队伍后一排，属于受接见最佳位子。我背后密密麻麻一排排人群。听营长

说，还要等四小时。我们是半夜三点钟出发，六点到达西单，大家要耐心再耐心，也是一种革命考验。在等待中，大家都吃光了随身领给的所有干粮。太阳出来了，人人觉得暖和了些，在解放军战士带领下，一支接一支革命歌曲此起彼伏，人人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毛主席万岁”声响彻云霄，个个兴奋满腔，群情昂扬万分。九点五十分，军代表再次演示接见时注意事项，一排排人都席地而坐，不准站起来，每个人右手摇动红宝书语录，左手搭在前排人肩上，以按揪住前排人不准站起来。这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从东西长安街一线望过去，十里长街，百万红卫兵组成的红色海洋，托起他们心中永不落的红太阳，黑压压、红彤彤的人海一片，小将们异常兴奋地遥望天安门城楼，望眼欲穿地盼望伟大统帅、红总司令毛主席登楼接见。

上午十点正，无数只高音喇叭中传出了《东方红》雄壮嘹亮的乐曲，红卫兵小将们最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似巨风、像海浪，一潮高过一潮，山呼海啸般地回荡盘旋在天安门上空。这时，天安门城门洞里开出卫戍部队的军车来，紧接着是毛泽东独乘的敞蓬越野车，第二辆是林彪，第三辆是周总理，一辆接一辆，上面站着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首长。当检阅接见车列开过我们的队伍区，毛泽东离我只有三十米不到的近处，我清清楚楚看见他挥动巨手招呼，魁伟高大的身材，连面部下颚那颗长命痣也一目了然。一代伟人的样子，真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红卫兵小将们像发疯似的呼啊、叫啊、喊啊、哭啊，人类历史上空前狂热的场面，使我终生难忘。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海潮般地拼命向前涌，之前演练的纪律早已忘记干净。前排压阵的解放军、公安战士拼命用人墙堵住蜂拥的人潮。我被后排人浪压倒，我前面的解放军又被人推倒在我身下。我灵敏地一滑溜爬起来，奋力挤上前去，却被几个武装警察死死拦住。毛泽东接见车队快速开过了混乱场面。我们每个人都像一颗小石块，在这巨大的海浪猛打盘谷般旋涡里打转，无法浮上来，也不能沉下去，只有顺随着那股人海巨浪涡旋不休。人海喧嚣，群情鼎沸，“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震天动地，万万千条手臂，挥动着千千万万本红宝书，胜似红色巨浪翻滚。人潮爆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狂呼，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袜被踩踏掉了，“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见到了毛主席，鞋袜全踩掉也算不了什么（当天事后听广播，通知大家到首都体育场去领鞋子，去领的人回来说，起码有几千双各种各样的男女鞋子）红卫兵们以十倍的狂热，百倍的虔诚，倾泻着教徒般的感情。

我周围如狂如痴的青年学生脸上个个洋溢着无边幸福的光彩，互相握手、激动拥抱，热泪盈眶，共同庆贺见到了伟大统帅毛主席，纷纷写下“1966年11月13日上午十点钟，我见到了心中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还怀着难以抑制的狂热，相互传看所写的历史性记录。我看到，有人写下：“我一定要永远不忘记这个幸福的时刻，发扬敢于造反的精神，勇敢地拿起铁扫帚，把一切公开的、暗藏的牛鬼蛇神横扫得一乾二净！”又有人写下：“今天我见到了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比爹娘亲一万倍，今后我只读毛主席书，只听毛主席话，他老人家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死不回头！”还有一个女同学写下：“今天我见到了心中千思百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发誓，今后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永远做您老人家最忠实的小兵！”看到这些，我不由想起在外国著作中读到的，阿拉伯人狂热朝拜麦加的历史情景。你想：当上百万没有人生阅历的学生做着同一个动作，挥手高举红语录，呼喊同一口号“万岁万万岁”，望眼欲穿期待瞻仰同一“伟神”时，这一虔诚的场面，能使人人发昏，空气凝固。我想：如果当时这位“疯神”要这一百万朝圣者去死，他们肯定赴汤蹈火，没有多少人敢顽抗。我又猛觉我与毛泽东距离这么近，如果他知道被我辉哥宣称为“暴君”，他必挥巨手将我与辉哥捏成粉末！我这时胡思乱想，不经意已被人潮涌到电报大楼，那里人头攒动，排着长队等着快发电报向家属亲友报告见到毛主席的特大喜讯。一忽儿，我又被人潮涌向天安门城楼，到金水桥边，成千上万红卫兵小将面朝城墙高挂的毛主席巨像顶礼膜拜，一个个无愧为造神运动的虔诚忠实信徒。有些小将还越过警戒线，去城墙边用手刮些红粉屑粒，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珍贵地藏进里衣袋，好似已获得了上帝的莫大恩赐，终生荣耀幸运无比。我凝望着庄严的天安门，望着这座中华民族历史变迁的无私老翁，忽发奇想，如果把辉哥奋笔疾书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张

贴在上面，中国亿万民众在惊雷闪电的震撼中，又会作何感想呢？

瞻仰过毛泽东一代风流人物的尊容，匆匆结束了在北京的五天串联活动，我登上南下列车，转道天津二天，参观了威震中国东海口的这座历史津门，又急忙赶上去大西南的列车，直抵四川成都，到附近的江油地区看望了四哥文正。本想再向西进云南，趁这免费旅游去看望在云南工作的五哥文龙。不料四哥紧急告诉我，辉哥从上海来信，要我一到江油，当即返回上海。于是我辞别正哥，风尘仆仆乘上回沪列车。在南京车站停靠下车片刻，巧遇我同学兄弟沈兴定，他告诉我已有人去学校了解借给我红卫兵袖章、学生证一事。我听了心头一惊，心急匆匆地登车返沪了。抵达上海，回到家中，已是11月26日的凌晨。谁知我出外大串联大出风光的个把月，犹如深水潜鱼浮跃水面，目标暴露显著，一场意想不到的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临头了。我这个在风雨交加中催生的“雨弟”，经历了十九年社会风雨洗礼，人生命运急剧转折，双脚跌进了人间地狱。而在“文革”的刀光剑影丛中，年轻有为、聪明睿智、才华横溢的辉哥，匆匆结束了他短暂而辉光永存的一生。

日夜遭“轰炸”

我漫长的牢狱生涯，开始就吃了两记耳光。

我深夜受审，凌晨4时后押进牢房，思绪万千，迷糊朦胧，禁不住搭上眼皮时，却被看守的一阵吆喝惊醒：“1548！七点钟过了，还在死睡，猪猡小赤佬！”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不由自主地用手背擦擦惺忪的睡眼，只听到门外大声吼叫“放水！”我禁不住一愣：“什么放水？”但见门上小框洞里有根皮管子塞进来，管内自来水哗哗地流淌一地。我那时连一只面盆也没有，更不懂“放水”什么意思，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为好。幸好我有点小聪明，灵机一动，心想是用水冲马桶的。于是我急忙抓牢皮水管，把它往墙角边的马桶水槽处拉。只怪皮管过短，拖拉不到马桶边。我情急生智，拼命用力一拖，自来水总算冲向了马桶。我正要松口气时，牢房门被“哐”地一声打开，看守员冲进来，对我兜头挥手狠打了两记耳光，并怒火百丈地骂道：“小赤佬！反革命！你竟敢存心找死！？”我被骂得蒙头转向，呆立了许久。

过了片刻，劳役犯从房门小框里递早饭给我，悄悄地对我说：“你闯祸了！刚才‘放水’是叫你用水桶盛好用一天的，你却把皮管拉脱了。皮管那头靠办公室，管头一脱，自来水冲洒到看守的办公桌上……”原来如此！我刚进来，哪里懂得这桩事，真是自作聪明，自遭挨打。我摸摸刚被打得辣豁豁痛的脸皮，心想这是我蹲进牢房受到的“下马威”。看守把我当作反革命分子，我不识相地拉脱了皮水管，真是该打该骂。他是站稳立场，严惩反革命！可是我呢？我是反革命吗？我已坐进牢房，失去了做人的起码权利——自由，除了低头认罪外，任何举动都是不被允许的。人身的自由已被剥夺了，还会有自己申辩的余地吗？……想到这里，我浑身寒噤，一阵阵颤抖。眼看身上还是单衣薄片，昨天清晨从外地串联回家，所穿的球衫绒裤都由辉哥给洗了，夜里被抓来时，随身单衫，怎挡得住初冬的寒冷！这牢房又不知道要坐到哪一天？再一想，辉哥分手时关照我“不要怕”，辉哥自己怎样了？一场生死抉择开始了，我怕冷什么？我怕二记耳光什么？勇敢地面对现实，看他们对我怎么样！？

我看过战争电影。每逢开战，总先由飞机大炮向敌人阵地狂轰烂炸，炸得对方蒙头转向，然后才是步兵冲锋陷阵。我踏进牢房，兜头被打了二记耳光，这可算是“狂轰烂炸”的开始吧，真正的人身疲劳“轰炸”是从当天下午开始的。

刚刚吞下了一碗粗糙难咽的牢狱午饭，我被押进了审讯室。审讯员还是昨夜审讯我的两位。一胖一瘦，一壮一老。

“1 5 4 8！困了一夜想清楚了没有？你自己干的反革命勾当，老老实实在地坦白交代！”矮胖的中年审讯员敲敲桌上的案卷声色俱厉地开了头。

“困了一夜”？天晓得我睡着了几小时！早上又被看守吃了耳光。“想清楚了”？我想什么，还不是想你们怎么知道我与辉哥一起干的。我反正已到了这地步，看你们怎么说。我抬头望望审桌台二位审讯员与一位记录员，耷拉着脑袋无话可说。

“1 5 4 8！”那位年长而消瘦的老审讯员一字一句缓声慢调地开腔道，“昨夜开头就说，你同你反革命哥哥是有区别的。你只要实事求是地把自己干的犯罪行为讲清楚，我们根据党的政策会给你从宽处理。犯罪的事实客观存在，你想回避抵赖都无济于事。现在是政府给你认罪、服罪的机会。千万别错过重新做人的良机啊！”

“我实在没有犯罪”，不知是被老审讯员缓和的态度所打动，还是因他反复说给我机会所诱惑，我脱口而出说话了：“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自小因小儿麻痹症瘸了左脚，平常行走都不方便。只知道在工厂里埋头工作，还帮厂里抄写抄写黑板报……”

“1 5 4 8，别打岔了！”矮胖的审讯员狠狠地敲打着案卷，凶神恶煞般地打断了我的申辩。“你是残废人，这点谁都知道。但是你的行动却麻利诡秘得狠！我再问你，十月一日国庆节你到哪里去了？你说！”

“我昨天夜里进来后就对你们说清楚了，国庆节我在厂里值班。你们不相信可以去厂里调查。”

“你在厂里值班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调查？老实告诉你，我们早已调查清楚了，现在看你自己交代不交代！”矮胖子得意洋洋地胁迫我，“死路、活路，你自己挑着走！”

面对他的凶狠威逼，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唯有的一种“权利”是“沉默”。就这样，任凭他们轮流反复审问，我耷拉着眼皮静坐在连地钳制的审讯椅上，甚至迷迷糊糊打瞌睡了……。约莫傍晚近五时，我被押送回牢房。

经过昨夜今天的折腾，我委实疲惫不堪。胡乱吃过一碗晚饭后，我躺倒床上，筋骨酸麻得无力动弹。不料牢门又被打开，看守大喊：“1 5 4 8，提审！”我又被押到审讯室。双方两次较量过了，矮胖审讯员开门见山地严厉发问：

“十月一日国庆节，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你顽固对抗，是要我们来给你剥狐狸皮吗？！”

“我说过多遍了，在厂里值班。”我回答有气无力，但仍然坚持这道“防线”。

“你年纪轻，不了解我们的办案能力。”年长的审讯员拿过压在矮胖子手下的案卷，打开来指着几份材料，郑重地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你国庆节的行踪，我们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你千万不要自绝人民。……”

我确实年纪轻，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记得自杭州返家后，辉哥曾多次与我商量好，一旦别人问起，只说国庆节在厂里值班，并且对老父亲也说好。于是我抬起了头，面对年长审讯员说：“你们不信，可去问我父亲，我真的……”

“嘿！你父亲！”矮胖子猛地打断我的话，“你父亲是老反革命！一家人都是反革命。”年长审讯员马上轻轻碰碰他的手。矮胖子毫无收敛地继续骂道：“历史反革命能证明现行反革命的行动？还不是相互勾结、相互包庇！”

“1 5 4 8，我不得不提醒你几句——”年长审讯员拿起案卷中的一份报告纸，指着说：“你厂里已经清楚证明‘刘文忠十月一日没有来值班，是第二日下午来厂里值班的。’还有，你邻居也证明，国庆节一早看你背着一个鼓鼓的包出门，晚上又见你背着空包回家的。你能否定这些铁的事实吗？”他头头是道的说完，一双严峻的眼光直视着我，像两道钢针直刺我心，顿时被他说的哑口无言。

“听到了没有？1 5 4 8！反革命耳朵聋了吗？”矮胖子也指着那几份证明材料，声嘶竭

力地训斥我。“你一举一动，你反革命哥哥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和人民严密监视之中。人民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绝不允许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他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大遍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我早已被邻居的监视证据震慑住了，呆呆地一动不动，脑海中轰然惊响：原来我家周围布满了“特务”！至于矮胖子下面讲了哪些大道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审讯室里沉默下来很长时间，年长审讯员语重心长地说：“1548，同参与反革命行动决裂是痛苦的，但是你要痛下决心啊！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我那天出去玩了……”还没有等我申辩完，矮胖子拍着桌子训斥道：“玩？还在抵赖！你同反革命哥哥进行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的阴谋活动，至今还要死硬顽抗。反动派不打不倒，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一定要打得你们稀巴烂……！”

面对他的咆哮叫喊，我只能钳口不言。这样又拖到深夜。当他们草草收场，把我押回牢房时，我拖着瘸着的寸步难移的脚，见墙上挂钟已是子夜三点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